

YINGGUO
GONGYONG ZHUYI
LUNLI SIXIANG
YANJIU

英国 功用主义 伦理思想 研究

牛京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牛京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振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牛京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

ISBN 7-01-003639-X

I. 英… II. 牛… III. 功利主义-理论研究-英国

IV. B8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7243 号

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YINGGUO GONGYONGZHUYI LUNLI SIXIANG YANJIU

牛京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9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639-X/B·310 定价:15.50 元

约稿编辑 方国根
责任编辑 张振明
封面设计 曹 春

目 录

导 言	(1)
1. 研究的宗旨和意义	(1)
2. 功用主义运动与功用主义思想	(5)
3. 功用主义的历史分期和本书研究范围	(7)
4. 关于“功用主义”译法	(11)

第一章 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初创——边沁与功用主义

的源流	(16)
一、英国近代社会与功用主义的产生	(17)
1. 社会利益冲突	(17)
2. 伦理关系的变动	(21)
3. 功用主义思潮	(26)
二、边沁伦理学的创立	(34)
1. 经验论传统的继承	(34)
2. 边沁的伦理思想体系	(44)
3. 边沁主义与社会改革思想	(54)
4. 密尔对边沁伦理思想的批评	(58)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边沁主义的衰落	(63)
1. 边沁主义与社会危机	(63)
2. 功用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	(67)
3. 功用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71)

第二章 功用主义理论的鼎盛时期——密尔对功用主

义的修正和扩展	(82)
一、密尔的思想转折	(82)
二、由外在向内在的发掘	(87)
1. 快乐与幸福	(88)
2. 个人的自由权与自我的发展	(103)
3. 良心的裁制	(111)
三、功用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确证	(119)
1. 功用原理的证明	(120)
2. 与义务论、直觉论的方法论论争	(127)
3. 功用与正义	(135)
四、密尔之后	(143)
第三章 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再度复兴——现代新功用	
主义伦理学论争	(158)
一、功用主义伦理学复兴的背景	(158)
1. 伦理学理论的困境及其进展	(159)
2.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165)
二、现代功用主义的基本转向	(170)
1. 学科背景和理论模式的转换	(170)
2. 话语方式的转换	(175)
3. 理论态度的转向	(179)
三、基本特征	(181)
1. 后果主义	(182)
2. 福利主义	(186)
3. 功用主义理论的可能性	(189)
四、主要论争	(196)
1. 准则功用主义与行为功用主义	(198)
2. 《正义论》与功用主义	(203)
3. 功用主义理论与个人	(208)
五、现代应用伦理学中的功用主义观点	(216)

1. 功用主义伦理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及其困难	(218)
2. 作为个体道德理论和作为公共哲学理论的功用主义	(221)
3. 应用伦理学中的功用主义及其他理论模式	(224)
4. 不同领域中的功用主义应用伦理学问题	(227)
结 语	(241)
主要参考书目	(252)
后 记	(259)

1. 研究的宗旨和意义

功用主义作为一种伦理理论,其萌芽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中间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到 17 世纪的霍布斯、洛克以及 18 世纪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处,才初步形成了可以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利用的功用理论。而本书所指的英国功用主义理论,是指 18 世纪在英国本土产生的由盖伊、塔克、佩利、边沁、葛德文等人所肇始的功用主义伦理理论。^①从理论实质上说,英国功用主义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和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密切相联系的;功用主义理论发展的起承转合像一支晴雨表,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自由发展到鼎盛、危机、再经调整而达到新的整合时期的历史变化过程。^②可以说,功用主义理论反映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确立过程,并且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理论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这就是贯穿在本书中的一条基本的社会历史线索。这一线索好比是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粗深悠长的主干,生长在其上的是功用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首先抓住这一主线,才可能充分认识功用主义贯通始终的本质特征,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中识别其本来面目,在一波三折的转换中始终把握其发展的基本方向;从另一方面来说,功用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和几个干瘪的概念的堆积,在它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有着丰满的理论、充实的内容,只有充分揭示这些具体发展阶段的特质,才有可能展现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枝繁叶茂、血肉丰满的整体形象。本书选取了三个阶段,功用主义初创时期(以边沁理论为主)、鼎盛时期(主要是密尔的理论)和再度复兴时期的理论,试图体现出将基本线索的把握与具体理论的精研结合起来的思路。

导言中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选题的意义。

首先,从英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功用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大生产所积累的巨大物质成果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制度变革的直接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到19世纪初时,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较为彻底地清除了小生产方式的影响,同时,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与阶级对抗也清晰地彻底地显露出来,并日渐尖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一书中写到的:“从经济观点上看,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③,从社会观点上看,产业革命“已使一些社会阶级诞生了,而这些阶级的发展和对抗正占满着我们时代的历史”^④。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这些变化要求社会其他领域相应的变革,功用主义在政治、法律、伦理上的主张正反映了这种时代要求。经过功用主义运动的洗礼,英国社

会的政治、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对于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完善社会的基本司法行政结构作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在功用主义学派的积极参与下,英国议会进行改革,扩大了选民范围,又先后颁布实施了新的文官法案、国民教育法案,改革了陈旧的司法制度。正是考虑到功用主义学派运动对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人们才指出,19世纪英国社会的重大改革都可以找到功用主义运动的影响。不仅如此,在那一场社会运动中,功用主义思想从政治、经济、伦理等各个方面为日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成功的论证和辩护,同时奠定了资本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法理学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学的基本构架。因此,如果我们把导致新教伦理产生的宗教改革运动看做是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认为,承载着内涵丰富、范围广泛的功用主义思想的英国功用主义运动,是促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完善化、成熟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其次,本书的主题——功用主义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在英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甚至在英国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功用主义伦理学承袭并发扬光大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和情感论伦理学特质,且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它的基本道德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在英国社会伦理、道德、立法、经济、政治等广泛领域得到普遍的应用,至今仍是立法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功用主义伦理学在英国社会享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实用性,甚至构成了英国文化的一种基本特质。因此,著名的功用主义伦理思想史家 E. 阿尔比指出,功用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可以被公正地看做是英国对伦理学理论发展作出的最有特色的贡献,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贡献的话。^⑤

进一步说,功用主义就它影响的范围之广、所涉及的论战程度之深以及绵延时间之久而言,堪称是世界伦理学说史上的典型。对于功用主义伦理学,不仅支持、辩护者甚众,持指责、批评态度的也同样大有人在;不仅在功用主义伦理学产生之初是如此,即便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也一仍旧贯;而且几乎任何一种新的伦理理论的提出或是一种旧理论的翻新,都不得不面临着赞同或是反对功用主义的选择,至少是对功用主义的基本问题、基本主张或基本思维方式加以评论。当代新功用主义思潮是在对来自义务论、常识道德等种种批评、指责和攻击加以吸收消化的基础上借鉴最新伦理学理论和经济学最新成果对古典理论进行修正和再创造的成果,自本世纪中后期产生之后,一跃成为规范伦理学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在现代各种职业伦理学、部门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理论中,功用主义是具有强劲声势的观点之一;一些新兴学派将它作为论战的对象,如女性主义伦理学以之为男性伦理学的代表,后现代主义也紧紧咬住功用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典型观点来批判。在我们看来,功用主义伦理理论的吸引人之处,一方面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基本的道德思考模式,主张从行为后果是否有助于幸福或快乐的增加、不幸或痛苦的避免,是否有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定行为的正当与否;它不是单纯从原则出发,也不回避具体行为所处的情境的复杂性,而是主张具体地分析、比较可供选择的不同行为的后果。这一理论的后果论思路、对个人以及社会的福利的注重、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调和以及对道德制裁力的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有益启示;对功用主义伦理学理论得失的探讨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维经验和思维教训。另一方面,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的诱人之处还在于,它本身具有特别强烈的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们的实际利益的实践性特点。功用主义关注利益或福利的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与利己

主义理论仅仅注重个人利益不同,显示了一种社会哲学的视野;正如前面所说,功用主义伦理思想凸显了社会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它对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以及物质利益与精神需要的关系问题都有讨论,而且将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与经济机制、经济基础联系起来,曾经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受到严肃理论研究的垂青。

综上所述,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无论是从英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理论本身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功用主义运动与功用主义思想

何谓古典功用主义(Utilitarianism)?人们通常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术语的:一方面,它是指产生、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社会、并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涉及广泛社会生活领域的综合性社会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它是指与那场社会运动相联系并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强调功用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尤其是指功用主义伦理思想。功用主义的这两方面的涵义是密切联系着的:功用主义运动是功用主义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和物质动力,功用主义思想和理论又进一步指导和规范了功用主义改革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融通,并且相互砥砺。因此,虽然本书侧重于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但是仍然对于功用主义运动给以相应的关注,以期从社会的、历史的背景中,从时代的需要中探求思想产生的根源、发展的动力以及形成其自身特色的原因。

功用主义这一术语的两方面的涵义虽然相互联系,但是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功用主义思想(尤其是功用主义伦理思想)并没有随着功用主义运动的式微而消亡,其精神主旨和思维要

素已经融入人类精神发展的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甚至成为西方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伦理学说的基本构架之一。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功用主义思想核心内容的古典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经过两百多年的曲折发展,它的现代形态仍然是今天西方乃至世界伦理学理论中最富有活泼生命力的一支。

在作为整体的古典功用主义思想诸种分支中,伦理思想是核心,这在古典功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J. S. 密尔等人那里已得到鲜明体现。边沁、密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都以伦理理论为前提和基础,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立法诸领域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运用和发挥。从另一方面说,功用主义思想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它关注的范围既包括对人的道德本性、行为判断和价值经验的研究,也包括对人们的利益、权利以及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的研究;这些方面实质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相互渗透的。因此,虽然功用主义伦理学理论作为整个理论的道德基础、灵魂和核心内容,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对它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仍然或多或少地会涉及诸如政治学中权利、自由、社会正义,经济学中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以及法学中法的本质和效力等观念,也就是说,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孤立进行,而应当在不同学科观点、概念之间的适当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之中把握伦理思想的实质。在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将发挥主导性作用。

上述对功用主义的两种涵义(其运动和其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及功用主义思想体系的内部联系的解释,是关于本书写作的基本态度的一个说明。事实上,功用主义伦理思想与功用主义政治、经济和立法等领域的诸种思想之间、功用主义伦理思想与功用主义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单是对这

种互动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内容丰富的课题。本书限于篇幅,将只在主题需要的范围内适当涉及这种互动关系。

3. 功用主义的历史分期和本书研究范围

英国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划分为 7 个时间跨度鲜明的阶段。

首先是“萌芽时期”,或者更确切地说,在 18 世纪之前的功用主义理论。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功用主义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伦理思想,中间经过基督教伦理的熏染,到 17 世纪英国经验论者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学说,以及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的公益理论,这些都可以称作功用主义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实际上提出了后来系统的功用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可以说是英国功用主义理论的思想源泉。

其次,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初创阶段——18 世纪的功用主义思想,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边沁时期”(从 18 世纪初到 1776 年边沁出版《政府片论》)和“边沁时期”。英国功用主义伦理学的正式产生是在 18 世纪,盖伊和塔克是最早的神学功用主义体系的提出者,他们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整个 18 世纪的功用主义者。佩利的神学功用主义思想承继并发展塔克的理论,引起了包括神学界在内的哲学、伦理学界的广泛争论;稍后的边沁将功用主义理论彻底世俗化,发展出一种以功用主义伦理理论为基础、以立法理论为核心、以社会改革为宗旨的系统的功用主义学说,他使理论全面面向社会的行政立法机构和人们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并且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由此功用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葛德文以他的政治功用主义理论确立了普遍利益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就这三位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地位而言,佩利的理论引起了理论界的较多的关注,神学家、直觉主义者、义务论者

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神学立场和功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长时间的批评或是辩护；边沁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相对于他的政治立法理论，在这一时期受到较少的理论关注，但是，边沁仍然拥有无可置疑的显赫声名，来自于他作为系统功用主义理论框架的确立者和声势浩大的功用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的重要地位；葛德文的政治功用主义理论在问世后曾经名噪一时，然而由于其理论的极端性和偏狭性，在其后的几年中就渐渐消匿。这一阶段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边沁的去世（1832年）为标识，在这之后，不仅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针对佩利神学功用主义的辩护和论争日渐淡出，而且由于密尔对边沁主义伦理学作出了总体评价而开启了对边沁伦理学的热烈争论和理论修正，这些因素标志着边沁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18世纪功用主义的终结，使功用主义伦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密尔是第三个阶段——功用主义伦理学鼎盛时期，或称“密尔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密尔最先对边沁世俗功用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优点和缺失作了客观的评价，从而使对边沁伦理学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成为哲学伦理学界的重要主题。密尔试图捍卫边沁所规制的古典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框架，他对边沁伦理学的修正以及对批评者的回应都集中在1863年正式出版的《功用主义》一书中。在密尔时期，功用主义获得了崭新的发展，它不仅获得了一种内涵上的修正，而且获得了更为理论化、更为精致化的形式，使得功用主义伦理学理论至今仍得以傲立于伦理学基本理论类型之列。但是密尔所做的理论修正和辩护也为日后功用主义伦理学内部的论争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1873年密尔的去世宣告了功用主义伦理学的鼎盛时期的结束，继之而来的是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反思时期。西季威克于1874年发表《伦理学方法》一书，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功用主

义的理论特质,要求调和功用主义与直觉主义伦理理论以修正功用主义理论;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和布拉德雷则从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出发,批评功用主义伦理学的理论;1903年摩尔在他的《伦理学原理》中提出,功用主义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从而给功用主义理论以致命的打击。此后英国伦理学研究发生根本的转向,语言逻辑学、非认识主义伦理学占统治地位,功用主义伦理学转入沉寂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规范伦理学的复兴、新自然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果主义讨论的中心化、社会哲学的转向等这些理论上的新发展,带来了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再度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延至今日,期间也经历了由高昂的发展势头到日渐平稳的理论发展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新功用主义秉承了古典功用主义的强烈关注现实的特点,所不同的是,现代新功用主义不再局限于社会立法和政治等社会领域,而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将实践的视野扩展到生命问题、核武器问题、社会分配问题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问题的各个角度。这一时期的理论,较之前几个时期的理论而言,内容最为繁杂,形式最为多彩,也最为明显地体现了功用主义理论与其他伦理学理论之间的冲撞和融合。

本书的研究,对功用主义伦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主要是18、19世纪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古典形态,以J. 边沁和J. S. 密尔的伦理理论为主,重点剖析功用主义的古典形式(第一章和第二章);与此同时,着意于追溯廓清其早期源头(第一章)、梳理阐发其现代发展(第三章);在书中尤为注重功用主义伦理理论发展的起承转合,分析勾勒其理论传承中的内在关节与外部契机之间的关系,以期将理论的研究和剖析建立在纵向与横向交汇的立体层面上。应当指出的是,为了深入解析功用主义的结构和特质,在对其古典形式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广泛涉及其现代

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像功用主义伦理这样一种理论,当它经历了从萌芽、鼎盛到衰落的漫长过程,而又能再度复兴时,它必定对自身的结构和特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并且在理论中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这样才可能在众多反对者的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攻击之下重新确立自身的地位。因此,功用主义理论的现代形态对其古典形式所作的修正和辩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后者在理论上的利弊得失,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化和评价的公允。对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的萌芽、鼎盛时期的历史回溯同样也有助于将现代讨论置于清晰的历史发展和理论转换的背景之中。通过审视功用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事实上远远超脱出它所赖以产生和创立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运动,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伦理思想范型。

通观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其历史之脉粗深悠长、一波三折,其现实之维浩繁灵动、变幻多端,要想全面地把握它绝非易事,本书的研究着重于四个方面:一是分析功用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它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的现实意义;二是阐释边沁在功用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地位,并通过密尔的理论修正剖析边沁理论的得失;三是剖析功用主义理论鼎盛时期密尔的思想及对早期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和对后起理论的启示,矫正密尔理论研究中的误读;四是梳理剖析功用主义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向、其基本特征和主要的理论论争,以期进一步加深对功用主义理论实质的认识。在不同的章节运用不同的叙述方法、侧重于不同的方面:边沁正式确立了功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将理论应用于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性特点,本书力图反映出这一点;密尔的理论相对于边沁的理论,有基于个人理论背景和个性的不同而产生的理论区别,也有基于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产生的理论区别,本书着力